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针灸名著集成/黄龙祥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8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ISBN 7-5080-0792-1

I. 针… I. 黄… II. 针灸学-古籍-汇编 IV. 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791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78.25印张 2000千字

1996年8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12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名誉主编 张文康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继兴	王立川	王锦之	郭敏德
史常永	吕炳奎	刘渡舟	李会庸
余瀛生	张灿如	陈可冀	陈即
尚志钧	施秉邦	钱超尘	郭霭春
程轶	李建华	焦树德	任应秋

总 策 划	王智钧	房建亭	张 伟
主 编	高文铸		
副 主 编	李俊德	刘日一	张 伟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伯海	牛兵占	刘日一	伊广谦	刘更生
李俊德	张 伟	张年顺	张瑞贤	胡晓峰
徐又芳	高文铸	郭君双	黄龙祥	盛维忠
蒋力生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序

高文铸

成功之道,读书为要。不管做任何学问,都是如此。古往今来,凡是在某一学科有成就的人,莫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怎样读书?先哲早有明训: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精”就是专门深入,精研细读;“博”就是广泛浏览,博极群书。精博相兼,成功就在眼前。

学习中医当然也不例外。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千秋不朽;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万代永传。要想成为一代名医,就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古今一理,中外皆同。

科学是有继承性的,特别是中医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摸索和积累。古人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临证经验,主要依靠中医文献作为载体延续发展。书以记文,文以载道,道以育人。历世流传的中医典籍,便是仁人志士步入医学殿堂的阶梯。

学以致用,困知勉行。读书与实践,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个医生,读书必须结合临证,临证不能脱离读书。历观古今名医的成长道路,都毫不例外地把读书与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勤奋读书,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又各自把读书心得和临证治验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宝藏。

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盲目阅读或漠然置之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些浩瀚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科学分析,深入钻研,由博返约,去粗取精,发扬光大。这样才能避开前人走过的弯路,把前人宝贵的经验继承下来,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未知的境界。尤其在受到西医的强烈冲击,中医临床实践机会相对减少的今天,师法古代名医名著则更加不可或缺。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广泛传播和充分利用祖国医学这份宝贵遗产,满足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读书、临证的需要,在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智钧先生、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张伟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先生、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房书亭先

生、中国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李俊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全国医古文研究会联合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在传世的近万种中医古籍中，经过反复论证，严格筛选，编纂了这套《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丛书。

《文库》以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为选书原则。根据中医学术发展的演变规律、当今中医药学的学科建制和中医药古典医籍的保存现状，共分为十二大类，计有《医经病源诊法名著集成》、《伤寒金匱温病名著集成》、《本草名著集成》、《方剂名著集成》、《针灸名著集成》、《内科名著集成》、《外伤科名著集成》、《妇科名著集成》、《儿科名著集成》、《五官科名著集成》、《综合类名著集成》、《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所收著作均以中小部头为主，大部头著作则单本刊出。每类《集成》少则收书十余种，多则二十余种，基本上代表了本学科古典医籍中最精华的部分。

《文库》以完整保存古籍、方便今人阅读、有利于学术研究为整理准绳。每种入选书目均以初刻本或最佳版本为底本，保持内容的完整性，不删一字一图。整理以点校为主，校注文字力求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每种入选著作均写有点校说明，叙述本书的著述缘起、成书过程、书名由来、体例结构、内容梗概、学术源流、学术评介、版本流传，以及后世研究概况、本次点校方法。每类《集成》书前撰写前言一篇，充分叙述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历史、所涵盖的内容和学术特点、主要典籍及其存亡流传演变，以及本次整理情况。每类《集成》书后附有“未收名著书目提要”，条贯群书，部次甲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引导读者了解和利用更多的典籍。从整体上看，每类《集成》既是该学科历代医籍的选粹，又是研究该学科学术内容的文献通鉴，具有永久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俗语曰：“求人不如求己，求师不如求书。”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是您的良师益友，置诸座右，恒而学之，它将使您步步走向成功。即使博雅之士，大方之家，插架翻检，知而后读，亦为治医之一助。

1997年元旦于中国中医研究院

前 言

前人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赅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书目答问》）。多年来，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及自身的实践，逐渐意识到：以丛书的形式整理针灸古籍，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更主要的是，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集中统一地整理医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研究方法所导致的片面、错误的认识，从而使得针灸古籍整理工作能在一个高起点上进行，从根本上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

一部丛书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书目的选择，而搞清针灸古籍的源流则是选好书目的先决条件。所以古代名家编全书、辑丛书，每以各类医籍源流考一篇署之卷端，例如明代《心印绀珠集》首篇为“原道统”；《医学入门》则始以“原道统论”；吴勉学集刊大型中医丛书《医统正脉》，也统论医籍源流以为序。至于针灸之书，明代靳贤博采群籍，辑成《针灸大成》名著，其首篇即为通考历代针籍之“针道源流”篇。医道源流之复杂，自不待言；而历代针籍之沿革，又岂易言哉！自非精通目录之学，通览现存医籍，又从何下笔。古人用心虽良，用功则未勤，上述诸篇医籍源流论多因袭前人旧说，实非亲览群书，“端本以寻支，溯流而讨源”之谓也。我才疏学浅，又不愿“走捷径”，剪取前人旧论，便只有用勤补拙，将国内馆藏针灸古籍一本本读过，继而参阅明以前综合医书、医经、方书，复从日本求得国内久佚之书，参互考比，以下就研究所得，对现存针灸典籍源流略加梳理，并结合本丛书的编纂，就针灸古籍的整理与研究议论一二，姑作全书之导论。

一、现存针灸古籍的数量与质量

郭霭春先生主编《现存针灸医籍》共收清以前针灸文献 129 种，其中针灸专书 99 种，综合性医书所载针灸专篇者 30 种。这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一些抄本及国内已佚而现存于日本的针灸古籍尚未收载（参见本《集成》后附“未收针灸名著提要”）。新版《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著录针灸古籍专书除去重复者共计 159 种，若加上笔者对国内（包括台湾）、日本各大图书馆藏书调查所见《联目》未载之中国针灸古籍，则现存针灸专书约 180 种。现存这些针灸古籍的学术价值如何？可信度如何（有多少伪书）？与亡佚针灸文献的关系如何（即现存文献记载的知识占几千年来古人所积累的针灸文献宝库信息总量的百分比。也就是说古人所总结的有关针灸学知识有多少被现存针灸古籍所涵盖）？搞清这些问题，是进行针灸文献研究及针灸史研究的前提。

在现存针灸古籍中有相当一部分书是完全，或基本抄录前代医书，或汇集类编前代文献。这些书的产生既没有给针灸文献库增添新的信息，也没有保存现已亡佚针灸文献，其所以存在的价值只在于针灸书籍匮乏的当时，对于针灸知识传播起到一定作用。这样的针灸书虽然各个朝代均可见到，但一般而言，明末以后的针灸书中这种情形更为多见（随着出版印刷业的发展，现代针灸文献中重复率远远高于古代）。例如徐春甫辑《经穴发明》、《针灸直指》二卷，基本节录自高武《针灸节要聚英》，徐氏新增的文字很少；明万历十二年三槐堂刊朱鼎臣编《徐氏针灸全书》基本抄自徐凤《针灸大全》，只是将徐氏原书编次稍加改动，并以另一部针灸方书替代徐氏原书卷四“八法主治病症”所采用的针灸方书；稍后，陈言氏又将朱氏《针灸全书》的编次稍加改动，题作《杨敬斋针灸全书》，同由建阳书坊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年间又有与杨继洲、靳贤《针灸大成》同名的针灸书，所载内容主要为针灸腧穴及主治，系节录自高武《针灸聚英》及杨继洲、靳贤编《针灸大成》，卷端题曰“吴文炳辑”。该书虽名曰“针灸大成”，但内容反而远不及吴文炳所编非针灸专书《医家赤帙益辨全书》系统、

全面,也颇可疑。另有抄本《针灸秘奥》一书系节抄自杨继洲、靳贤《针灸大成》,而编次与原书不同。又有清抄本《针灸摘要》也节抄自《针灸大成》;徐大椿《经络诊视图》则全文抄自张景岳《类经图翼》。此外,清代大量刊行的“太乙神针”类针灸书,尽管名目繁多,但内容均与范氏《太乙神针》大同小异。更有一些针灸书由多部前人医书合编而成,并伪托名人所编,实系伪书,如题曰“廖润鸿编”之《勉学堂针灸集成》一书即是。以上各例详见本丛书末所附“未收针灸名著提要”,此不一一枚举。

纵观现存 31 部明代针灸专书,严格意义上的论著可以说一部也没有,除《针灸大全》、《针灸集书》、《针灸问对》、《析骨分经》、《奇经八脉考》、《针方六集》等书中有部分考证、发挥文字,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见解外,其余各书均为汇集、类编前代针灸文献。其中只有《针灸聚英》、《针灸择日编集》、朱鼎臣《针灸全书》、《神应经》等保存有现已亡佚针灸文献。由此可见,明代针灸古籍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已远不如明以前针灸古籍,清代针灸书也是如此。

(一) 亡佚文献与传世古籍的关系

丹波元胤《医籍考》共载各类书目著录的明以前中国针灸古籍 166 种,除去编者将 9 种同书异名者误作不同书而另立条目外,实载书 157 种,其中有 117 种已佚(原书著录 87 种佚;43 种未见,今检其中有 13 种尚存)。可见,有相当数量的针灸古籍由于各种原因而散佚。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已经亡佚的文献呢?根据文献积累的规律,一部针灸书面世,如果其学术价值、实用价值高,便会很快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广为流传,一般很难散佚,即便是原书失传,其内容也会被当时及后世医书所载录(现代的情形也一样,权威著作、高水平论文会被同行反复引用,所以“引用率”仍是衡量论文水平的客观指标)。例如唐·崔知悌《骨蒸病灸方》原书虽佚,但内容却见载于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宋代崔丞相灸劳法原书也佚,而全书图文被载于宋代《圣济总录》、《苏沈良方》、《严氏济生方》、《幼幼新书》等书中;吴复珪《小儿明堂》原书已佚,而其全文收载于《太平圣惠方》第一百卷;《甄权针经》虽佚,但其主要内容却载于《太平圣惠方》、《千金翼方》等书中;《曹氏灸方》虽亡,其主要内容被陈延之辑入《小品方》中,今《小品方》针灸卷也不存,但其主要内容见载于《千金要方》等书中。《三十六黄经》原书虽佚,而其内容却载于《太平圣惠方》。经考察,现佚唐以前针灸方书中有价值者基本为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所载录;已佚隋唐间重要腧穴书内容则多为《太平圣惠方》所引录;现佚金元针灸书绝大部分为《医学纲目》所引录。

金元时期,受《素问》亡篇《刺法论》等书的影响,注重对刺法的研究与应用,在针刺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有关刺法及针方专著,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针灸特点。这些针灸珍籍,除了针灸大师窦汉卿的针经、杜思敬所辑针书、王国瑞《针灸玉龙经》以及元明时流传极广的《玉龙歌》(与一部腧穴专书合抄)尚存外,其他原书多已失传。但经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学术价值较高的针灸书基本被明清医书所采录。引录金元针灸文献最多者为明初楼英《医学纲目》一书,该书除引录了《针经指南》、《针经摘英集》、《玉龙歌》等现仍传世的金元针灸名著外,所引其他这一时期针灸书中有一题作“《集》”者,详注针法,强调辨证,注重配穴,是一部典型的针方专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未见书目记载,书名与著者均不详。经多方考察,此书今尚存有明抄书录本(卷首残缺二页,书名仍未详);明末《针灸大成》卷九“治症总要”即全文录自该书,清代《针灸指要》也录有此书原文。明末《审视瑶函》除录有该书原文外,还录有取穴图。一部未曾著录,也从未曾刊行的针方书能对后世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凭借的正是其所独具的临床价值。此外,《医学纲目》还完整保存了元代针灸科教授忽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所附的全部四幅“明堂图”,此图又被明清许多医书转载,成为明清时期流传最广的腧穴图。又元代王国瑞《针灸玉龙经》一书也保存不少金元针灸文献,其中所载《盘石金直刺秘诀》一书,是以针方为主的针灸方书,很有特点,此书也未见书目著录,著者不详。王国瑞所抄录的只是该书一种节本,经考察该书全文收载于清代针灸书《针灸集要》

中。明初刘纯《医经小学》等书引录金元时《针经》一书的大量文字。徐凤《针灸大全》卷四“八法主治病症”下文字也主要录自一部金元时针灸方书，但其临床价值远不如上述二部针灸方书，故未见《针灸大全》之外医书引录。由此可见，金元时期的针灸著作虽然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针灸书的基本内容多为后世医书反复引录，而其价值不太高的针灸书，《医学纲目》一书也有引录。那些既不存原书，也不见佚文者，只是一些价值不高的针灸书。

应当指出的是，有些针灸名著的亡佚实属自然淘汰，例如元代针灸科教授忽泰著有《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当时流传很广，而自滑伯仁在此书基础上补注、发挥，编成《十四经发挥》后，“人始嫌其（指《金兰循经》）简略矣”，传习者日少而原书散亡。这样的针灸名著虽遗而无憾。今《金兰循经》文字部分除见载于《十四经发挥》外，还见于滑伯仁《读素问抄》；取穴图部分也为楼英《医学纲目》等书完整保存至今。

当然也有个别学术价值较高的针灸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公开，他人难以得见而无法大量引录，久之原集散佚。例如明中期著名针灸家凌云针灸著作即由此而亡，后世医书所引录其书的文字也很少。不过这样的佚书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可以说，现存针灸文献宝库中保留了有史以来绝大部分有用信息，从现已出土的针灸书及非针灸书中的针灸方情况看，基本上都可以在传世医书中找出相同或相类的文字。我们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这些传世针灸文献，特别是针灸名著的研究上，而不应错误地认为：大量针灸珍籍还藏于地下，或已荡然无存。

最后谈一谈“孤本”。某种书现仅存一部者称之为“孤本”，由于其罕见而倍受重视。现存针灸古籍中也有一些孤本，多为晚清抄本。尽管手抄孤本中也有珍品，例如上述明抄节本元代针方书及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閣文库的《针灸集书》抄本，其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均很高。但就笔者的初步考察而言，现存孤本，特别是晚清抄本多半系东拼西凑而成，学术价值不高。例如《针灸六赋》、《针灸要法》均抄自《针灸大成》，其中《针灸要法》所据版本为清代重刊本；《仙传神针》实出自范氏《太乙神针》。有些抄本内容尽抄自《针灸大成》、《类经图翼》、《医宗金鉴》等书中针灸歌赋、简易治法，或抄自《太乙神针》一类书，内容皆浅显，可能系抄录者用作自修针灸入门读物，而并非为著书立说，故不题作者姓名，也不记年代。这类孤本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更有一些抄本实为伪书，如《针灸秘奥》一书，内题“仙传针灸直指秘奥”，实则此本乃节抄自清代重刊本《针灸大成》，改编者只抄录赵文炳序而撤去其他序，并将正文重新编次以充古本。有藏书家不明真象，以此本出自赵文炳手抄本，即《针灸大成》原稿本，故视为珍品而神之（见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旧《联目》也将此本年代定为明万历二十九。又《经学会宗》残卷，题曰“双林卧岩凌云汉章定本”，实则此书图、文系后人节抄自张景岳《类经图翼》一书（考证见本《集成》后附“未收针灸名著提要”）。故切不可一见孤本，就以为价值连城，视为珍品。研究孤本针灸古籍应在系统研究其他常见针灸书基础上，系统进行有关目录学研究及针灸古籍的辑佚工作之后进行。试想，如果对常见针灸典籍尚且不熟悉，对针灸古籍的存佚情况及佚文不了解，又如何对孤本针灸书的来龙去脉、学术价值及真伪进行科学地鉴别呢？真假尚且不明，其学术价值也全然不知，则谈不上进行高水平的研究。

（二）伪书、伪本举例

辨伪、辑佚与校勘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辑佚、辨伪工作的基础，校勘的质量便无以保证。在全面考察针灸文献的同时，我们系统地进行了针灸古籍的辑佚工作，而将辨伪贯穿于辑佚工作的全过程。

同其他古籍一样，针灸古籍也有一些伪书，如果不能加以识别，必然会给针灸古籍整理工作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以下就笔者近年考察所发现的伪书举例说明：

1. 《勉学堂针灸集成》四卷 旧题“廖润鸿编”。此书系由《类经图翼》、《东医宝鉴》、《针灸经验

方》三书拼合而成,编排多有不当。卷首序文系廖润鸿《周身经穴考证歌》自序,与《针灸集成》毫不相干。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2.《针灸秘奥》四卷 考证见上,此处从略。

3.《经学会宗》残卷 旧题“明·凌云汉章定本”。实系后人抄自张景岳《类经图翼》,非出自凌云之手。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4.《铜人针灸经》七卷、《黄帝明堂灸经》三卷 此二书系由《太平圣惠方》第九十九卷《针灸》、第一百卷《明堂》改编而成。后人不明原委,对此二书多有误解,例如《普济方·针灸门》将此《铜人针灸经》与北宋官修针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混为一谈;将《针灸四书》所收之《黄帝明堂灸经》三卷与王执中《针灸资生经》所引之《明堂经》相混同。

5.《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 旧题“赐太师刘真人集”。前有“崇宁初元年”序,全文抄自《十四经发挥》吕复之序。此书与《琼瑶神书》原书内容迥异,显系后人伪托,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此外还有一些真伪掺半的针灸书,例如:

1.《痲疽神妙灸经》一卷 旧题:元·胡元庆著,明·薛己校补。此书首载“至正甲子永昌杨子成序”,而元至正年间无“甲子”年,杨序全文有一大半文字与《十四经发挥》所载明翰林学士宋濂序相同,则此序盖出于伪托。若此序即原书序,则《痲疽神秘灸经》当成于明·洪武二年之后。因为据《明史·宋濂传》,宋濂于洪武二年任“翰林院学士”,宋氏序既自题“翰林学士”,则其序作于洪武二年之后。现存不同版本编次等也有不同,详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2.《神应经》一卷 旧题“陈会善同撰,刘瑾重校”。日本正保二年(1645)重刊本并载有洪熙乙巳(1425年)宁献王朱权序。此书既是著名席弘针派传人陈会所撰,书中必然会记载席氏临证经验,而现行本中主体部分——腧穴证治却主要据《普济方·针法门》改编而成,完全不像出自针灸临床大家之手。但《四库全书》所据浙江朱氏曝书亭藏本,无朱权序,作者项题作“明·陈会撰,刘瑾补辑”,这提示:现行本《神应经》有可能系刘瑾在陈会针灸书节本的基本上进行大量增补而成。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3.《琼瑶神书》四卷 不著撰人,原书三卷,后递有增补。从内容上看,显然成书于宋以后。编者似为兼通针术的道人。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应当指出的是,伪书并非全无价值,要细加鉴别。有的书误题或伪托作者,或误认年代,一经辨清,其价值自明。例如传世本《素问》有附“刺法论”篇者,宋臣校书时已谓其出于后人,托名王冰为注。若视此篇为《素问》原书旧文,成于两汉之前,固然不可;然该篇毕竟出自宋初人之手,文中系统总结了唐宋间针刺法经验,乃继《素问》之后对针刺法的又一次总结,对金元乃至明代的刺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学术价值之高不容忽视。而林亿校书时以此篇晚出而轻之,谓其“辞理鄙陋,无足取者”。受此影响,后世医家对此篇也多不甚留意,现存诸《素问》版本中也多不载此篇,或只载正文而不录注文,而使其学术价值久不为人所知。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早期针灸文献,特别是宋以前针灸古籍,其基本构成一般较复杂,例如《甲乙经》一书早在宋人校正之前,就已见有一些古人增补、附注的文字,北宋林亿校正时,又有所增补、改编;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针灸卷均已经过宋人的改动;《针灸资生经》注文既有王执中的原注,又有校订者卫世杰的补注等。这些书已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原书旧貌,严格说来,应于著者项下,将原作者与重编整理者的姓名一并题上,这样才不至于误解。以往对于某些医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考证结论之分歧多由于不明此例所致。

与伪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版本之伪。一般而言,伪本是指由书商用各种手段作伪,以年代较晚版本充早期刊本,而今人在版本鉴定时未能识别所误定的版本。还有相当一部分书,书商并未作伪,

完全是由于在版本鉴定时不认真而误将晚期刊本定为早期刊本。这种情形不独见于针灸古籍,其他中医古籍中也很常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伪本,特别是早期针灸名著的伪本,对于针灸学术及针灸古籍整理的不良影响甚至超过伪书,不可忽视。如果整理者缺乏版本鉴定经验,而误用这类鉴定错的版本作为底本,或主校本,那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以下举例说明:

1.《针灸大成》十卷 书目著录最多的是明万历二十九年原刊本,而晚出的清·顺治“重修本”、清顺治、康熙“递修本”却罕见著录,显与常理不合。经笔者系统考察发现,所谓“明万历二十九年刊本”多系用清顺治“重修本”及清顺治、康熙“递修本”伪充,并非原刊初印本。

2.《针灸甲乙经》十二卷 日本现存之“抄正统本”者,经考察,实系据《医学六经》本改编而成,难以为据。又书目所载现存“明万历二十九年刊”《医统正脉》绝大多数系清代书坊“重修本”,而非明万历原刊本。

3.《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 日本《和汉籍图书分类目录》记有“明正统八年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然未查及有可靠资料记载,明英宗正统八年重刻宋天圣石刻的同时,刻有《铜人图经》木刻本;也未见正统一万历初针灸书直接引录《铜人图经》者。现存各本《铜人图经》三卷本之缺字、错字与正统石刻拓本相吻合,甚至错简情况也与现存一种石刻拓本相符,这说明《铜人图经》木刻三卷本初刻年代晚于拓本拓印年代,而不可能刻于正统八年。

4.《西方子明堂灸经》七卷 据笔者考察,此书约成于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或稍后。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而书目却记有“北宋刊本”者,系将《郡斋读书志》所载《明堂针灸图》与此书相混同。

5.《针灸聚英》四卷 原书自序记年为“嘉靖己丑”(1529年),黄易序于“嘉靖丁酉”(1537),则此书初刊于1537年。而书目却记有“明正德十四年刊本”,吴继东先生已撰文证其伪,原文见《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期(署名为作者笔名“吴叟”)。

6.《针灸易学》 中医书目著录有嘉庆三年李守先自刻本。实则此本系据“道光本”重刻本,书商抽去许天锡道光二十七年序而伪充初刻本。

以上所举仅仅是一些重要书例,书目中所著录的误本还有很多。笔者以往常据书目著录某馆特藏某版本,委托该馆复制,结果常常是名实不符,枉费了钱财与精力。后来只好亲自实地考察,也每每无功而返。如果我们不下功夫将这类伪本一一识别,必将深受其害。故整理针灸古籍,一定要注重版本鉴定及版本源流考察工作。

二、针灸文献源流考略

作为一部丛书来说,其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书目的选择,而考察针灸古籍的源流则是选好书目的先决条件。即使单独研究某一本针灸古籍,也必须首先搞清其来龙去脉。为此,我首先通读了所有现存馆藏针灸古籍,然后系统研究,搞清各书之间的承袭关系,进而反复研读筛选出的重点书目。在此基础上又广泛阅读了其他中医古籍,特别是大型综合性医书、方书、经典医籍,以比较针灸医籍与其他医籍演变规律的异同以及相互间的渗透。下面就多年来系统考察所勾勒出的古代针灸文献沿革轮廓作简要论述。

(一) 经络腧穴类

汉代医家系统总结了包括《内经》在内的汉以前医书中的针灸方,编成了第一部针灸腧穴专著——《明堂经》。魏·甘露中皇甫谧将此书与《素问》、《针经》二书反复比较,去其重复,分类合编成《针灸甲乙经》。唐代政府先后两次命人重修《明堂经》,其中杨上善校注本《黄帝内经明堂》将全部349穴分别归入十二经及奇经,另据《内经》、《难经》,于各经之前补辑总论一篇。此本现仅残存第一卷。甄权所修订《明堂图》内容多为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针灸卷所抄录。王焘《外台秘

要》第三十九为“明堂”卷，内容主要辑自《甲乙经》，由于当时《甲乙经》传本已有脱文，故王焘还参考了包括甄权、杨玄操在内的其他《明堂》。这部《明堂》较少被宋人改动，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初唐针灸大家甄权总结其多年临床经验，编成一部《针经》。由于此书直接出自编者的临证实验，故对于腧穴刺灸法，特别是刺法的记述具体而明确，而且与主治症紧密联系，有很强的针对性，与一般腧穴书只对刺灸法作原则性的记述明显不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虽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被《千金翼方》，特别是《太平圣惠方·针经》第九十九卷所载录，对宋以后的针灸腧穴专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黄帝明堂》一书在宋代已不存，故北宋医官王惟一奉命编修一部针灸腧穴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在《太平圣惠方》针灸卷、《外台秘要·明堂》的基础上，又总结了当时针灸名医临证经验，对于腧穴主治症及刺灸法作了少量的增补。此书颁布后，即成为宋代针灸教育及临床取穴的依据。北宋末官修大型医书《圣济总录》第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卷所载腧穴即全录自《铜人图经》；此后南宋王执中为了便于临证选穴处方，仿孙思邈《孔穴主对法》之例，将《铜人图经》、《圣惠方》针灸卷及《千金要方》第三十卷中腧穴主治症重新编辑，并于卷首直录《铜人图经》腧穴部位原文，合编成一书，名曰《针灸资生经》。此后明初大型医书《普济方》针灸门几乎全文引录了《资生经》腧穴证治内容，但在编排上采用病症在前，取穴在后的形式；稍后刘瑾辑《神应经》时，将《普济方》的腧穴证治加以节录、改编，使之更像针灸方；明中期杨珣《针灸集书》卷上针灸治疗也节录自《资生经》。

元末医家滑寿在忽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的基础上，补注重辑，编成《十四经发挥》一书。该书完全按《灵枢·经脉》所载十二经脉及《素问·骨空》所载任、督脉的循行方向及路线，循经考穴，将《铜人图经》所载周身 354 穴连接成与十四经循行线相应的十四条经穴连线。这种腧穴分类法对后世的腧穴归经影响很大，明代《针灸集书》、清代《循经考穴编》均仿其例而编。现代腧穴书中的腧穴归经也依据《十四经发挥》。现存元代的腧穴专著只有一部，与单行本《玉龙歌》合抄，原书名不详。内容与吴崑《针方六集》所引“窦氏”之文相近，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另有《窦氏秘传》一书也辑录了金元针灸大家窦太师的穴法内容，其编者及成书年代均未详。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有人将《太平圣惠方》第九十九、第一百卷改编后单刻，分别题作《铜人针灸经》、《黄帝明堂灸经》，后人多将此二书与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及《明堂经》相混。

明中期，高武对针灸腧穴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编成《针灸聚英》一书。该书引用文献非常丰富，并作了许多考证工作。可惜，高武当时没能见到王惟一《铜人图经》一书，故书中腧穴主治症主要从王执中《针灸资生经》中辑录，由于这一工作难度很大，故辑录不全及辑录不当的错误不可避免。这些错误又经过《针灸大成》的转录而对现代腧穴书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明末靳贤在杨继洲《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增补改编成《针灸大成》一书。该书第六、七卷腧穴主要采自《针灸聚英》，但所载腧穴数及腧穴的排列顺序却与明中期针灸铜人相同。又明末吴文炳也辑有一腧穴书，名曰《针灸大成》，内容辑自《针灸聚英》、靳贤《针灸大成》。之后张景岳又对针灸腧穴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编成《类经图翼》一书。与高武不同的是，张景岳对针灸歌赋也很重视，将其中腧穴内容附于相应穴下。该书对清代针灸腧穴书的影响甚至超过《针灸大成》一书。

在腧穴专书中有一类题作“灸经”的专书或专篇，例如《外台秘要》第三十九卷“明堂灸法”、《太平圣惠方》第一百卷“明堂”、《西方子明堂灸经》等。这类书实际上主要取材于“针经”类腧穴书，只是编者出于某种考虑，删去了原书中的刺法内容而已。其中《西方子明堂灸经》系选编《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图经》三书腧穴内容而编成，既缺乏新意，又有许多改编失误之处，不甚可据。

(二) 临床治疗文献

古代针方、灸方，或针灸方专书不多，流传至今的则更少。

现存最早的灸方为敦煌卷子灸方（原卷子编号 S. 6168、S. 6262），原书残缺，书名及著者均不详。今检此残卷内容多见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故原书当成于唐以前。

宋代针灸临床书仍以灸方为多，而且逐渐形成专病专穴的灸法。庄绰系统总结各家灸膏肓穴法，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编成《灸膏肓膈穴法》一书；宋代医家在唐·崔知悌《骨蒸病灸方》的基础上补辑改编成《崔丞相灸劳法》一书，并刻于石碑。原书已佚，佚文及附图见于《圣济总录》、《苏沈良方》、《严氏济生方》等书；宋人在痲疽病简易灸法的基础上总结出“骑竹马灸法”，编成《骑竹马灸法》一书；闻人耆年选集前人治急症灸法，并参以己验，编成《备急灸法》一书；北宋医官吴复珪精选各家灸小儿病方，编成《小儿明堂》一卷，对宋以后小儿病灸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金元时期，随着刺法研究的兴盛，出现了不少“针方”类医书。这类针方书讲究配穴，详述刺法，与前代灸方书只简单记载灸方明显不同，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现存金元针方书有：《直刺秘传》（《玉龙经》载有此书的节本；全文见《针灸集要》）、《针方集》（现存有明抄节本，全文为《针灸大成》、《针灸指要》载录）。此外，《玉龙歌》、《针经摘英集》所载均以针方为主。这一时期的灸法书有专治外科痲疡的《痲疽神秘灸经》。

明清时期的针灸方书较少，临床价值也不高。清代针方书有《济世神针》、《刺疗捷法》；灸方书有《太乙神针》、《灸法秘传》等。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针灸书如《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针灸资生经》、《普济方·针灸门》、《神应经》等书所载膈穴主治症在形式上与灸方颇相近，今人多将其误解为灸方。

（三）综合类

综合类针灸文献主要是一些汇编型针灸书，或是某一医家的针灸论文集。金代有《子午流注针经》选集针灸歌赋，记载经脉循行，论子午流注针法；元代《针经指南》、《针灸玉龙经》主要汇集窦太师的针灸文集；《琼瑶神书》则侧重于刺法及针灸方治；《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大成》、《针方六集》等书系针灸文献的汇编；《针灸问对》系汪机的针灸文集。

以上简要论述的针灸文献源流，如果辅以若干“针灸古籍源流简图”图示，则更加简明易记，但限于篇幅，此处从略，读者可自行补上。

三、把握总体特点，提高校勘质量

整理及编排方法直接关系到古籍整理质量的高低，而科学的整理方法的确定则依赖于对所整理的对象——针灸古籍特点（包括其常见错误类型）的把握及对前人、他人整理古籍经验的总结。

古代针灸文献特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同名异穴

由于针灸膈穴并不是在同一天，由同一个人发现的，所以在膈穴的名称上就必然表现出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同一穴而有不同的名称，即所谓“同穴异名”现象；第二，不同的膈穴而有相同的名称，即所谓“同名异穴”现象。不了解这两种，特别是第二种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古代针灸文献。事实上古今针灸文献中不少错误，正是由于不了解“同名异穴”现象所造成，试举例说明如下：

针灸膈穴中凡一穴多名者，数名之中有一个为正名，其余则为别名。“同名异穴”现象一般也分为两种：其一，两个不同的穴，其正名完全相同；其二，两个不同的穴，其中一穴的正名与另一穴的别名相同。

针灸古籍中，正名相同的膈穴有九对：三里（手、足部各一）、五里（手、足部各一）、上廉（手、足部各一）、下廉（手、足部各一）、窍阴（头、足部各一）、临泣（关、足部各一）、通谷（足、腹部各一）、阳关（膝、腰部各一）、通里（经穴、经外穴各一）。这九对同名膈穴出现在膈穴专书中，因其下均记有明确

的腧穴部位,一般不会理解或辨识造成障碍。但如果是腧穴部位与主治症相分离的针灸书,如《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针灸资生经》以及各类医书中所载的大量针灸方等,要准确地辨明这些文献中的九对同名穴,决非易事。所以,从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针灸甲乙经》古注文、王焘《外台秘要》、宋代王惟一,一直到现代的针灸书,只要采用了上述文献,便无一例外地出现同名穴辨识错误。在同名穴辨识方面出现错误最为严重,而且对现代针灸学影响最大的针灸书是明代中期高武的《针灸聚英》一书。此外,南宋《西方子明堂灸经》一书在引录《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时,也出现了许多同名穴相混的错误,但此书对现代针灸书的影响不大。

因腧穴正名与别名相同而引起误解最多的是凶会穴别名“天窗”与小肠经穴“天窗”。《医心方》卷二记曰:“凶会,一名天窗”。敦煌卷子灸方(原编号S. 6168、S. 6262)残卷两首灸方中均记有督脉凶会穴——“天窗”,两方均注明了穴数,其中有一灸方附图中还标明了“天窗”穴的部位,而今人受强大的习惯心理的影响,仍将此二方中的“天窗”穴解作手太阳小肠经穴。又经笔者考察,《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所载“天窗”穴几乎均为“凶会”别名,而后人均误以为手太阳经穴。

(二)脉、穴相混

在宋以前的早期针灸文献中,诊脉部位、经脉、腧穴等可见有完全相同的名称。例如“足阳明”或指跌阳脉,或指整条足阳明经脉,或为经穴名(相当于冲阳穴)。一般而言,当“足阳明”出现于针灸方中时,多指经穴名。后人不明此例,而对宋以前文献中此类古穴名多有误解。又如十五络穴名原本是络脉名,此外尚有一些别络穴如“委阳”、“大包”等也本为脉名。在早期腧穴书所载这些络穴或别络穴定位文字中还残留一些相应络脉循行部位的描述。历史上由于将络脉循行部位误作络穴部位而造成腧穴定位分歧最大者,为委阳穴。《甲乙经》曰:“委阳,在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膈中外廉两筋间,扶承下六寸,此足太阳之别络也”。这里记述的是足太阳别络的走行,故可见有“膈外廉”与“扶承下六寸”两个不同的部位(《甲乙经》所载大包穴下的部位同样为络脉的走行部位),据络穴的定位规律,“委阳”当定于膈外廉,以其在委中穴外侧(阳侧)而得名。后人不解此义,多将此穴定于扶承下六寸处,与殷门穴同高。

另一因脉、穴相混而致误的典型例子是“颞颥”。此词原指耳前动脉,又指穴名,约相当于耳前“太阳”穴(见《千金要方》卷十)。古人进而将耳后动应手处也称作“颞颥”,故“脑空”穴又名“颞颥”。杨上善《明堂经》注曰:“顶骨相接之处,每鼓颌则颞颥然而动,故以为名”(转引自《医家千字文》)。南宋王执中不明“颞颥”一词的不同含义,将不同腧穴定位中的“颞颥”一词均代换成“脑空”,宋以后针灸书多沿袭此误。其他如“廉泉”穴与“廉泉”脉相混淆者,早在金元时李东垣已有详考(见《医学发明》)。

(三)甲穴误作乙穴

有一些腧穴的名称字形很相近,太溪—天溪;大泉—天泉;小海—少海;箕门—期门;昆仑—内昆仑—上昆仑等,针灸古籍经多次传抄、刊刻,这些相近的穴名很容易相混。这些错误若出现于《铜人图经》这样的腧穴专书中,并不难发现,但如果出现在《甲乙经》、《针灸资生经》这样的针灸书及各类医书所载的针灸方中,后人很难识别。例如现行本《甲乙经》所载全部五条“少海”穴主治条文均为“小海”穴之误。类似错误还普遍见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素问》王冰注、《铜人图经》、《针灸资生经》、《针灸聚英》等书中。

另一类二穴相混的错误则更难以察觉。早期针灸腧穴文献中不同腧穴文字均相连续抄录、刊刻,在出现漏抄或脱文时,如果正好脱落一穴名,则该穴下的残留文字便混入上一穴中。例如现通行本《甲乙经》卷三第35篇所载足太阳经穴中,“仆参”穴的后半部及“昆仑”穴前半部文字脱落,则原昆仑穴残留文字便混作“仆参”穴中。后人不识此误,于该篇末,据《素问·刺腰痛》王冰注文补录了

“昆仑”穴内容。今人则以为此条为错简，遂将全文移至“仆参”穴下，掩饰了错误的痕迹，后人则更难识别。卷七至卷十二腧穴主治条文中的类似脱文所造成的二穴相混者，也不乏其例。

由于避讳的缘故，还会造成一穴变成二穴者。例如手少阳经“清冷渊”，又作“青灵渊”，唐人避高祖名讳而将其写作“青灵”。宋代王惟一不知其中变故，而将“青灵”误作另一穴，并将其归入手少阴心经，一直沿误至今。

鉴于针灸古籍普遍存在上述问题，在校读古代针灸腧穴文献时，若发现有某穴主治症与腧穴主治的一般规律不符时，应首先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同名穴或字形相近穴相混，以及某一穴名的脱落所造成的“张冠李戴”错误。

(四) 日灸量与总灸量相混

一般针灸腧穴书中所载腧穴的灸疗壮数多为一次(日)的灸量，而《肘后方》、《小品方》、《千金要方》等书所载针灸方下除了注明某穴的每日灸量外，还注明总的灸疗壮数；或只注明总灸量(因为日灸量一般变化不大，与腧穴书所载相近)。初唐针灸大家甄权将其针灸临证经验系统总结，编成一部腧穴专书，名曰《针经》。该书对于腧穴的灸疗壮数多分别注明日灸量与总灸量，甚至还注明了完成总灸量所需的疗程数。例如：

上管一穴……灸亦良。日灸二七壮，至一百壮止，不遑更倍之。

曲池二穴……日灸七壮，至二百壮。且停十余日更下火，还至二百壮罢。亦可从一至

七，减至五也(转引自《太平圣惠方·针经》第99卷)。

甄权《针经》佚文被后世腧穴书引录，于是宋以后腧穴书中对于腧穴的灸疗壮数的记载便有日灸量、总灸量、日灸量与总灸量三种形式。后人不解其意，多将腧穴的日灸量与总灸量混为一谈。书写形式也多变成“日灸二七壮至一百壮”等，与日灸量形式无异。或以此数作为日灸量，剂量太大，便在抄录时将原壮数大幅度地减少。例如《圣惠方》载关元穴灸法原文作“日灸三十壮，至三百止”(意即：每日灸三十壮，经十天灸满三百壮时停灸)；水沟穴灸法为“日灸三壮，至二百即罢”；阴交穴“日灸三七壮，灸至七百止”。此外，还视不同情况，日灸量可逐日递增或递减。如前顶穴灸法作“日灸二壮，以渐增至七从三，总至八十一壮罢”(意即：第一天灸二壮，以后每天加一壮，第六天加至七壮后不再增加壮数，而以每天七壮之数，直灸至第十五天灸满八十一壮为止)。对于这类灸法，王惟一编《铜人图经》时，或将原文中总灸量删去(如列缺、上星穴等)，或将总灸量减少，或不录原文首字“日”字及最后一字“止”字，遂与原文本意不符，例如将上述“关元”穴灸法改作“可灸百壮至三百壮止”；水沟穴作“可灸三壮，至七壮即罢”；阴交穴作“可灸百壮止”；前顶穴作“可灸三壮，至七七壮即止”。经过王惟一这番改动，宋以后人更难知此类灸法之本意。

(五) 腧穴文献的积累不呈层累型

古人在编修本草文献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后人编修时，总是先抄录前代文献，而将新总结的内容附于后。这样代代相沿，层层累叠，使得各代文献均被系统地整理而又避免了大量的重复。可是与本草文献性质很相近的历代针灸腧穴书却多半不采用这种方式编撰，而是多采用东拼西凑的方式集录，或甲穴抄自一书而乙穴抄自另一书，或腧穴的部位采自一书，主治症录自一书，刺灸法又辑自一书，且多不注明出处。这种整理方式效率很低，一方面不同时期所整理的腧穴书有相当程度的内容重复，另一方面又会有一部分文献因未能及时被后代整理者抄录而散佚。同时这种整理腧穴文献的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弊端，缺乏科学性。

(六) 腧穴主治与针灸方相混

皇甫谧编《针灸甲乙经》时，往往将针灸腧穴书《明堂经》中较复杂的腧穴主治原文分作若干条，分别归入卷七至卷十二的不同篇中。为了与所录《内经》文字相谐，将原《明堂经》的腧穴主治文字改

作病症在前,腧穴在后的形式,即“××病症,××穴主之”;之后唐代孙思邈又将《明堂经》中主治症相近的腧穴合编为一条,改用腧穴在前,病症在后的形式,即所谓“孔穴主对法”,以便于临证选穴;宋代王执中仿其例,将《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图经》三书的腧穴主治均按此法重编;明初《普济方·针灸门》在抄录《资生经》腧穴主治时,又将其改成“病症在前,腧穴在后”的形式;《神应经》又进一步改编,使之在形式上与针灸方毫无区别,若非对针灸文献极为熟悉,根本无法分辨。

(七)体例特殊

有些针灸古籍的体例非常特殊,而“凡例”中又未作说明,后人很难了解,因而无法正确理解原书。例如孙思邈在编《千金要方》第三十卷“孔穴主对法”时,将《黄帝明堂经》及少量其他针灸书的腧穴主治内容重新编排,即将原书中主治症相近的数条文字合编为一条,但数穴下所列主治病症一般为第一穴的主治原文。例如“中冲、劳宫、大陵、间使、关冲、少冲、阳溪、天谿主热病烦心,心闷而汗不出,掌中热,心痛,身热如火,浸淫,烦满,舌本痛”条中所录主治病症,实为第一穴“中冲”的主治原文,而“劳宫”等七穴的主治症只与该条病症中某个,或某几个病症相同或相近。这一体例非常特殊,故唐以后所有引录《千金方》该篇原文的医家无一人能识别,宋人也不例外,其在校《甲乙经》卷七“热病烦心,心闷而汗不出,掌中热,心痛,身热如火,浸淫,烦满,舌本痛,中冲主之”条时,于条末注曰“《千金》作天谿”,显然系将上述《千金方》条文中的主症误作最后一穴所主。类似的错误在《甲乙经》校注中不乏其例。由于林亿等人不解其例,又无《甲乙经》、《千金要方》相关的“穴名索引”,故其对于此二书腧穴部分的大量校注基本是错误的,或毫无意义的。又如《甲乙经》卷七至卷十二所载腧穴主治条文中,有七对同名穴,要想准确、简便地加以辨别,必须考察出该书的腧穴主治条文的排列序例,即:该书卷七至卷十二的腧穴排列次序与卷三相同。《针灸资生经》卷三至卷七的腧穴主治条文主要录自《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图经》,欲知原文的出处,也必须了解该书的体例:凡抄自《千金要方》条文前皆用“主”字;引《太平圣惠方》者冠以“疗”字;引《铜人图经》者以“治”字。

熟悉上述针灸古籍的特点,不仅有助于阅读理解针灸古籍,而且在整理校勘时可使许多疑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大大提高校勘质量。

四、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

与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不同,宋人比较注重考据,勇立新说,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超于前人的突出成就,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宋人考据时往往表现得过于自信,刻意求新,以致于窜改古书,例如鲍彪注《战国策》,“其篇次先后,则以己意改移,非复向、巩之旧,是书窜改古本,实自彪始”(见《四库全书总目》);朱熹注《大学》,也完全打乱原文顺序,重作编排。宋人这种轻易改书的弊端在医书整理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未经宋人整理的古医书极少流传下来,故人们对于宋人私改医书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给古医籍所造成的危害都缺乏足够认识,以至于在古医籍研究中遇到许多困惑而不得其解,甚至出现许多失误而不自知。试就宋人改书的一般情况举例分析如下:

(一)重新编次

早些年在研究《千金要方》等书时,常常发现原书中宋臣注文(关于现存宋校本医书中宋人注文的识别,详见本书《《针灸甲乙经》考略》)所注引文出处与实际不符,例如第二十九卷“大都”穴下注曰:“肝脏卷云在足大指本节内侧白肉际”;又“涌泉”穴下注曰:“肝脏卷云在脚心大指下大筋”。此二条文字均不见于现行本《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肝脏卷,而见于第二十卷膀胱卷。待多读了几本书之后,所遇到的类似例子越来越多,颇令人费解。直至十余年前得见日本静嘉堂文库珍藏的宋刻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影印本(见日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出版的《东洋善本医学丛书》第二辑)时,才解开了多年的疑惑。该本未经宋人校改,与日本古抄本《真本千金方》及未经宋人校改的《医心方》、《太平御览》、《太平圣惠方》所引《千金方》文字多吻合,可见其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孙氏《千金要方》的旧

貌。以此本与宋臣校改本《备急千金要方》对照,发现宋臣校注时已将孙思邈原书顺序完全打乱,进行了重新编次。不仅是各卷的次序不同,而且将不同卷中篇目进行了重新组合,甚至各篇中的条文顺序也作了重新排列。而宋人在对该书乃至他书校注时所引《千金》之文往往按改编前的原书编次标注引文出处,自然令读者困惑不解。例如以上所引二条文字本见于原书第十一卷(肝脏卷)“治筋极第四”,宋人重编时将其移至第二十卷“膀胱卷”(此改动无理),而在第二十九卷引这两条文字出注时仍作“肝脏卷云”,这样的失误是不该出现的。今宋校本《千金方》中宋人注文所标引《千金方》卷数与校本不符者,多由此所致。同样,宋人在校《脉经》、《千金翼方》等其他医书时,也对原书的编次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从而出现了宋以前古医书引文出处与现存宋校本不符的现象。又如,未经宋人校本《千金方》第二十七卷“平脉法”(宋校本移至第二十八卷)各篇的条文顺序与北宋初《太平圣惠方》第一卷吻合;而宋校本《千金方》与原书大不相同,却与宋校本《脉经》的条文次序吻合,可见,宋人对《脉经》一书也作了相应的改编。

(二)删改原文

宋人在校注《素问》之外的古医书时,对原文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其中将某些药名、度量衡名、文字改成当时通行的名称或写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改编则颇令人困惑。十年前我在校勘《甲乙经》时,发现一些《甲乙经》特有的文字出现在成书年代较早的《脉经》中。当时苦于资料不全,尚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现象,只好在校本中提出了问题,而未作具体分析。后来在读其他医书时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通过对原书体例的深入研究,逐渐认识到:以上问题多由宋人校书时径改原书所致。待认真研究了未经宋校本《千金方》之后,对宋人私改古医书之例了解得更加具体。试以宋校本《千金方》为例分析如下:

宋校本

何为三部?寸关尺也。上部为天肺也,中部为人脾也,下部为地肾也。何为九候?部各有三,合为九候,上部天两额动脉……

——卷一·诊候第四

经曰:诊脉之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均,气血未乱,乃可诊有过之脉(《脉经》云过此非也)。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可以此参伍,决生死之分也。

——卷二十八·平脉大法第一

病先发于肝者,头目眩,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二日之胃而腹胀;三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酸;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卷十一·肝脏脉论第一

以上第一条文字,《千金方》原本是讲人体上、中、下九处脉诊法,宋人误以为是独取寸口诊脉法,故增“寸关尺也”一句,而使原文无法理解。第二条文字宋人作了较大的改动,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校《脉经》一书时对这段文字也作了同样的改动,并注有“《千金》同”字样。第三条原文,录自《脉经》,原文出自《素问》,类似文字又见于《灵枢》,皇甫谧编《甲乙经》时将《素问》、《灵枢》二篇之文合编成一篇。宋人校《千金方》时,以《甲乙经》之文为胜,便取以替代了《千金》原文,同时也替代了《脉

未校本

三部者,上部为天也,中部为地也,下部为人也。何为九候?部各有三,合为九候,上部天两额动脉……

——卷一·诊候第四

经曰:诊脉之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乃可诊脉,视其五色,察其精明,现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可以决生死之要也。

——卷二十七·平脉大法第一

肝病,头目眩,支胁痛,一日体痛,二日胀,三日腰脊背少腹痛,胫酸,十日死。若冬则日中夏则早食。

——卷十一·肝脏脉论第一

经》中的相应文字。于是《甲乙经》中的文字特征便出现于成书较早的《脉经》一书中，令人莫名其妙。对于《千金要方》其他卷引录《内经》文字，宋人也多据《甲乙经》加以改写；对于腧穴部分，或据宋代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改写。

相对而言，宋人校书时删文较少，删除的文字多数为原书的注文，或内容与篇题、体例不合的文字，例如卷三十“孔穴主对法”是孙思邈以《黄帝明堂经》为主，并参考其他针灸书，类编而成，其中引录原书针灸方时仍按针灸方的形式直录原文，宋人校书时以此类文字与通篇体例不合，而将针灸方中的刺灸法文字删除，使之与《黄帝明堂》的腧穴主治文字在形式上完全一致。如果后人不察，而将这类文字也作为《黄帝明堂经》佚文而加以辑复，则又错上加错也。此外，经过宋人校注的医书中还可见大小字相混的现象。例如《千金方》卷十一第一篇中原小字注文，在宋校本中被误排作大字正文；又如宋校本《脉经》卷二第四篇中前半部分原注文全部脱落，后半部注文原书作大字，系吕广旧注（可能《脉经》所引《难经》文字系据吕氏注本），宋校本中均作小字，与宋人注文在形式上完全相同，后人根本无法分别。当然，宋校原刊本已失传，现存本为影南宋重刊本，故不能完全排除由于版本的不同所造成的大小字相混的可能性。

（三）增补

这里所说的“增补”，不是指原书有脱文，据其他的版本补缺，而是指原书本不缺，另据他书增补新的内容。例如宋人校《千金方》、《脉经》时，据《甲乙经》增补了大量文字，其中只有个别补文作了说明（但均未注明据何书补），更多的补文则未作任何说明，如果对原书的体例不作深入研究，又无未经宋人校改的相关文献可供参考，则很难识别这些宋人增补的文字。例如宋校本《脉经》卷七“重实重虚阴阳相附生死证第十九”篇中“右重实重虚部”之前的一大段文字均不见于《千金方》、《圣惠方》，而与《甲乙经》卷七第六中的文字、文序完全吻合，体例也独与《甲乙经》同；显然是宋人所添补。因为类似的文字已见于《脉经》卷一“平虚实第十”篇，并见于未校本《千金方》及《圣惠方》，系宋校本之前《脉经》旧文（只是个别文字已经过宋人的改编）。宋人不察，于卷七第十九篇中据《甲乙经》补辑，因而文字特征与卷一第十《脉经》旧文大不相同。正是由于宋人校《脉经》时，对原书改编、增补太多（参见宋臣“校定《脉经》序”），故该书卷端均题作“林亿等类次”，与别书题名不同。其实，宋人所校的医书，除《素问》外，均应作如上题名，或作“林亿等重编”，以免后人误解。

（四）误改误注

除了重编、妄改、妄补外，宋人校书时还由于时间仓促，校书前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对所校原书的体例未能认真研究等原因，在校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失误。考察分析宋人的校书错误，对于当前的医书整理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1. 不详原文出处而误校例

宋人校《素问》时，常以《甲乙经》一书作他校，而《甲乙经》主要是类编《九卷》（即《灵枢》古传本）、《素问》、《明堂》三书而成，原文多不注明出处。宋人疏于详考，而误以《甲乙经》录《九卷》之文校补《素问》，例如：

《素问·刺热》：热病始于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聩好眠，刺足少阳，病甚为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阳、少阴。

类似文字还见于《灵枢·寒热病》、《太素·寒热杂说》、《甲乙经》卷七第一中。宋人误以为《甲乙经》此篇文字录自《素问》，故在校《素问》上述文字时，于“热病先身重骨痛”句前，据《甲乙经》补录了“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一条，并注曰：“按此条《素问》本无，《太素》亦无，今按《甲乙经》添入”。其实，此条文字，不仅王冰注《素问》本无，《太素·五脏热病》、《甲乙经》卷七第一上录《素